



私與公領域中的客家意識— 馬來亞大學客籍學生之探討*

林開忠*

摘要

在東南亞歷史、經濟與政治結構的侷限下，客家認同或客家意識是隱性或雙重隱性的。但在晚近的研究中，學者也發現在東南亞的客家社團中，似乎還存有保留客家認同或客家意識的功能，雖然那被視為認同標籤的主要元素，如客語等的保存或推動卻很少成為客家社團關懷的重點，它們所彰顯的客家性，並非靠著社會文化建構而來，而只是原生情感的一種表達：即因為祖先的血緣關係而建立起來的一種群體意識。東南亞的客家認同，至目前為止，充其量只具有某種我族－他族的差異認知，而由於這種差異認知是存在於華人族內，因此在很多場合下，這些差異認知是可以被忽略的。但是這種以社團組織為主的研究，除了可能有都市中心的偏差外，還可能有城鄉、世代差異的偏頗。本文試圖從馬來亞大學內的客家知

* 作者現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教授。

通訊地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1號

電話：049-2910960#2878

傳真：049-2918541

Email: ktlim@nccu.edu.tw

收稿日期：96.09.06 刊登日期：96.12.13

識青年之訪談，來討論他們的客家認同或客家意識的世代現象，同時補足我們對於馬來西亞客家所處的環境之了解，他們如何界定自己？是否不同教育背景者對於客家身分的雙重隱性有所差別呢？

關鍵字：公領域、私領域、客家意識、世代差異

The Hakkaness in Private and Public Spheres— A Study on the Hakka Students in University Malaya

Lim Khay Thiong

Abstract

Under the limitation of histor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ructures in Southeast Asia, Hakka identity or Hakka consciousness is invisibility or double invisibility. However, in the current researches, scholars also discover that there are preservation of Hakka identity or consciousness in Hakka organiz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although they seldom promote those essential elements of identity such as Hakka language. Therefore, we can see that the Hakkaness in Southeast Asia is not represented through socio-cultural construction, but an expression of primordial emotion. Hakka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 at most, exists only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which, in many circumstances can be ignored. However, the studies based on Hakka social organizations, will unavoidably reflect urban-bias, and also biases of urban-rural and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interviews with the young Hakka students 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we will discuss their Hakka identity and consciousness, and also understand the Hakka within Malaysian context, how they define themselves? And we will als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Hakkaness of the Hakka youth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Key words: Public sphere, private sphere, Hakka consciousness,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一、前 言

在東南亞歷史、經濟與政治結構的侷限下，客家認同或客家意識是隱性或雙重隱性的（張維安、張翰璧 2005；Hsiao and Lim 2006）。但在晚近的研究中，學者也發現在東南亞的客家社團中，似乎還存有保留客家認同或客家意識的功能，雖然那經常被視為認同標籤的主要元素，如客語等的保存或推動，卻很少成為客家社團關懷的重點；更多的情況是，客家社團就像華人社會中存在的其他地緣性社團，如福建、廣東、海南會館等一樣，是一種華人性（Chineseness）的表達；換句話說它們所彰顯的客家性、福建性等，並非靠著社會文化建構而來，而只是原生情感的一種表現：即因為祖先的血緣關係而建立起來的一種群體意識。如果說族群意識的生成本身是透過人們對我族 vs. 他族的差異認知、對不平等待遇的感受、並進而集體地組織起來要求公平待遇的政治動員下的產物，則東南亞的客家認同，至目前為止，充其量只具有某種我族－他族的差異認知，而由於這種差異認知是存在於華人族內，因此在很多場合，這些差異認知是可以被忽略的（Siow 1983）。但是這種以社團組織為主的研究，除了可能有都市中心的偏差外，還可能有城鄉、世代差異的偏頗（關於城鄉客家認同的差異，請參考蕭新煌等 2007）。

眾所週知的事實是，在東南亞的客家社團中（大部分的華人社會組織也都如此），組織內活躍的會員或領導幹部幾乎都是 40 歲或以上年齡者的天下，我們在東南亞客家社團的訪談中，也常出現這些幹部對所謂社團的「斷層」憂慮之慨歎，可見這種傳統社會組織對年輕世代的吸引力不足是相當嚴重的問題。從張維安與張翰璧

(2005) 在中央大學，針對馬來西亞客籍留學生所做的調查可以發現，客家年輕世代的客家認同或意識似乎比起他們的父母輩更為淡薄。就像他們的父母一樣，他們也深受來自華人作為一個整體以及馬來西亞國族的雙重夾擊，因而使得其客家意識更為隱晦。這些從馬來西亞來到台灣求學的學生，絕大多數是具有至少 12 年華文教育背景者，即 6 年的華文小學跟 6 年的華文初中跟高中教育的客籍子弟。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跟異族接觸的機會本來就比較少（除了地方上的公家單位，如郵局、警察局、消防局或異族販賣或開設的飲食店外）、異族朋友不多或甚至沒有，譬如可能住在以華人佔多數的城鎮鄉村，加上華文學校的異族學生原本就非常有限，尤其是進入中學階段後更是如此，他們平常所接觸的訊息來源，包括流行文化的吸收，幾乎清一色為港台的產品；對於港台流行文化之了解更甚於他們對自己國內主流（馬來）文化流行趨勢的掌握，在政治立場上，也由於華文教育在馬來西亞坎坷的奮鬥、掙扎所凝聚成的一種「悲情」意識，透過華文教育的傳輸，讓這些接受華文教育者產生一種受壓制族群的認同，並因為社會接觸的不足而產生對馬來人（因為馬來人掌握了政府/政治的優勢）整體的歧視或偏見（參考林開忠 2000）。

客籍年輕輩的教育背景以及其當下所處的環境對他們的客家意識有影響嗎？在前述的研究中，研究者所訪談的對象大多是受華文教育的馬來西亞客籍大學生，他們身處在台灣這個以華文（國語）為優勢的國家，加上台灣客家文化社會運動也正如火如荼地推展著，這些因素是否也影響了他們對於客家意識的堅持呢？也就是說當東南亞的客家子弟被放到台灣的情境時，他們的客家意識會否因為可以在台灣接觸到更多關於客家的訊息，包括客家語言、文化、

媒體以及各種族群活動而更為突顯嗎？這些議題值得在未來做進一步的探究。

再者，有的客籍青年則是留在馬來西亞，他們的教育背景大多為接受六年的華文小學教育，之後進入以馬來西亞國語為教學媒介的國民型中學，有的最後並順利地考進本地大學。本文即是以馬來西亞大學內的客家知識青年為對象所進行的訪談，一方面討論他們的客家認同或客家意識的世代現象，同時補足我們對於馬來西亞客家所處的環境之了解，他們如何界定自己？是否不同教育背景者對於客家身分的雙重隱性有所差別呢？

二、基本資料

本文資料來源為筆者於 2006 年 7 月間，前往馬來西亞大學（簡稱馬大）進行短期研究訪問時所進行。¹ 訪談對象係透過朋友間的介紹取得。本研究訪問了 11 位馬大在籍客籍學生，由於非隨機取樣的樣本，因而未必具有代表性，但從他們的訪談中，我們還是可以了解當地客家青年的客家認同狀況。根據他們所提供的基本資料作成下表：

¹ 在此感謝馬大中國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提供短期訪問研究之設備；同時，馬大社會人類學系鍾惠嫻小姐協助部份的訪談以及介紹受訪者，使得訪談得以順利進行，在此也一併感謝。

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一覽

| 受訪者 編號 | 性別 | 州屬 | 科系 | 父母籍貫 | | 父 母 職 業 | |
|-----------|----|-----|------|------|------|---------|----------------|
| | | | | 父 | 母 | 父 | 母 |
| V001 | 男 | 彭亨 | 人類社會 | 客家 | 福建 | 建築工人 | 建築工人 |
| V002 | 女 | 砂勞越 | 中文 | 客家 | 客家 | 木匠 | 家管 |
| V003 | 女 | 砂勞越 | 中文 | 不詳 | 客家 | 臨時工人 | 書記 |
| V004 | 男 | 馬六甲 | 中文 | 客家 | 福建 | 工廠工人 | 家管 |
| V005 | 女 | 檳城 | 中文 | 廣東會寧 | 廣東順德 | 中藥小販 | 家管兼褓母 (去世前) |
| V006 | 男 | 馬六甲 | 東南亞 | 客家 | 海南 | 水泥工人 | 家管 (去世前) |
| V007 | 男 | 砂勞越 | 電子工程 | 客家 | 朝陽客家 | 小販 | 家管 |
| V008 | 女 | 柔佛 | 法律 | 客家 | 潮州 | 老師 | 老師 |
| V009 | 男 | 柔佛 | 經濟 | 客家 | 客家 | 商 | 家管 |
| V010 | | 吉隆坡 | | | | | |
| V011 | 男 | 森美蘭 | 會計 | 客家 | 客家 | 會計師 | 家教老師 |

我們的樣本中有一半的（6位）受訪者是來自非城市的鄉村地區（譬如 Batu Kawa、Raub 等），另外一半則為都市地區的客家青年（包括吉隆坡、芙蓉、新山以及馬六甲市區）。從他們的父母所從事的職業來看，我們可以知道有 64% 的受訪者之父母來自華人社會的中下階層，有些甚至是勞力階層的工人，這似乎符合客家人過去以採礦、務農為主的經濟活動；只是到了晚近，當人們從農村往鄉鎮移動後，填補了比較低層的勞力經濟活動。這些來自以客家人為多數的鄉鎮地區的客家子弟，由於生活上的需要，客家話似乎是他們日常生活中必備的語言工具。最後，從受訪者的父母籍貫也可以看出，大多數為華人亞族群之間通婚的後代，父母同屬於客家人的只占少數。

三、馬來西亞情境中的客家人

在馬來西亞，客家人雖然貴為華人人口中的老二，但客家話卻只有在少數地區流行，譬如沙巴的古達（Kudat）、砂勞越的石隆門（Bau）等比較小型的城鎮，通常客家話只在客家人居多的鄉下地方成為優勢語言，這跟客家語並非商業用語而使它的傳播受限有很大的關係。所以，即便早期客家人曾經是吉隆坡華人中的多數，但在吉隆坡的優勢華人方言最後卻是具有商業力量的廣府話的變化就可以了解了（Tan 2000；Carstens 2005）。²

這一方面說明了客家人乃是華人移民中的弱勢群體，而這樣的弱勢處境顯然是跟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內陸、鄉鎮有關，城市客家人畢竟是少數。然而，在歷史發展上，城市客家移民卻曾經是新馬地區最早創立地緣性會館組織的方言群體（Yen 1995），這反映了作為弱勢群體急需社團組織以保護其政治經濟利益有很大的關係。在組織型態上，鄉鎮客家人跟城市客家人不同，他們比較強調軍事武功的功能，譬如十九世紀的石隆門十二分公司（林開忠 2003）；同時鄉鎮客家語言與文化的保留上也跟都市客家有所不同（參考蕭新煌等 2007）；更重要的是，誠如 Sharon A. Carstens 在研究馬來西亞吉

² 根據研究顯示，吉隆坡客家人勢力的衰落跟英國殖民政府於 1901 年取消甲必丹制度有很大的關係。當時的廣東籍殷商如陸佑、陳秀連等人開始崛起，由於商業勢力強大，加上他們是及政府委任的雪蘭莪州議員，因此，對吉隆坡的發展影響很大；後來廣府人的商業勢力還有陸秋傑及張郁才等人的興起，這是造成葉亞來之後的客家人的勢力開始從吉隆坡隱退的主要因素。因此，近日的吉隆坡街道名，我們可以找到許多以廣府商人名字為主的街道，如陸佑、陳秀連、秋傑等路名，而以客家人為主的路名只有葉亞來路一條，也可視為廣客勢力在吉隆坡更替的結果。有關客家人開拓吉隆坡之討論，請參考黃文斌所著〈論析吉隆坡華人社區的形成與客家人的參與〉一文，於〈吉隆坡繁華功不可沒，客家學數典論功績〉，東方新聞網，網址為：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_item.asp?NewsID=4275。

蘭丹內陸的布賴客家人所獲得的結論一樣：鄉村客家聚落的同質性很高，又處於比較孤立的環境，因而使得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不會特意凸顯「客家意識」。她發現在公私領域裡，布賴客家人擁有不同的認同展演：在私領域裡，客家聚落中已婚婦女的穿著、食物料理、飲食習慣等都相當受到馬來在地文化的影響；但在公領域裡，客家男性則透過廟宇等社區的活動展演那些被認為比較「純」的華人文化形式（2005：73-80）。總結來說，馬來西亞的客家人，在人口數，加上所居住的地區又以鄉鎮為主，因此在經濟勢力上佔弱勢。

根據「馬來西亞華人特有社區詞語解讀及交流版」一文作者的估計，目前馬來西亞華人各語群人口、分佈情形以及其語言通用概況如下表：

表 2 馬來西亞華人語群人口、分佈與語言通用概況

| 大馬華裔方言族群人口統計 (以 600 萬華裔人口作基準) | | | 方言分佈及概況 | |
|----------------------------------|-------|-----|-------------------------------------|--|
| 籍貫 | 估計人數 | 比率 | 主要聚居城鎮 | 通用現狀 |
| 閩南（通稱福建人） | 210 萬 | 35% | 檳城、巴生、馬六甲、麻坡、峇株巴轄、昔加末、居鑾、新山、哥打峇魯、古晉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華語（普通話）已成馬六甲及南馬華社主要溝通語。 · 巴生河流域及週邊地區深受粵語方言影響。 · 北馬、東海岸登嘉樓州及吉蘭丹州甚至東馬古晉的閩南語的使用者也有老化現象，成年人以華語和孩子交談。 |
| 客家 | 144 萬 | 24% | 怡保、吉隆坡、沙登、檳城（亞依淡、浮羅山背）、吉打北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客家方言源流支派多（惠州、河婆、梅縣、大埔等），各有不同口音，整合不易， |

| | | | | |
|-----------|-------|------|---|---|
| | | | 部（章峯）、森美蘭（芙蓉、知知港）、沙巴 | 無法像粵、閩方言般成為強勢語言。 · 西馬客家人主要與廣東人和福建人雜居，被強勢語言影響，家長選擇用廣東話或華語與孩子溝通。 |
| 廣府（通稱廣東人） | 108 萬 | 18% | 霹靂中南部（怡保、金寶、美羅）、吉隆坡（巴生河流域）、芙蓉、山打根 | · 粵語成為本地電視台中文節目／中文電台主要媒介語，新一代年輕人逐漸向港式粵語靠攏，與廣府話發源地廣州漸行漸遠。 |
| 潮汕（通稱潮州人） | 66 萬 | 11% | 檳城（大山腳、峇眼色海、巴里文打）、雪蘭莪（吉膽島、適耕莊）、柔佛（新山、笨珍）、砂勞越（民都魯） | · 由於潮汕人大都與福建人雜居或住在發展較緩慢的地區，正被華語及福建話強力影響。 · 受新加坡的電子媒體及“多講華語、少說方言”運動影響，南馬華裔家庭多以華語交談。 · 受檳島影響，大山腳這片潮州人聚居地的通用語已變成福建話。 |
| 閩東（通稱福州人） | 30 萬 | 5% | 砂勞越（詩巫、美里）、霹靂（班台、實兆遠）、柔佛（永平）、森美蘭（武吉不蘭律） | · 漸漸受華語大趨勢的影響，華語成為這些方言族群後代的慣用語。 · 真正能掌握各自方言者已經少見（除了福州人佔大多數的詩巫）。 |
| 海南 | 24 萬 | 4% | 散居於以下州屬（森美蘭、馬六甲、柔佛、吉蘭丹、登嘉樓） | · 大部分海南人後代都不諳海南方言，主要以廣東/華語為媒介語，語言流失情況嚴重。 |
| 廣西 | 9 萬 | 1.5% | 彭亨（文德甲、文 | · 港式粵語的流行造成其他粵 |

| | | | |
|----|-----|----------|---|
| | | 冬、勞勿、立卑) | 語方言分支受到影響，大馬祖籍台山、廣西等粵語族群後裔傾向於說所謂的“標準”粵語而抹殺了這些弱勢粵語的生存空間。 |
| 其他 | 9 萬 | 1.5% | |

資料來源：<http://www.angelfire.com/sc/YewWeng/language.html>。

從表 2，我們可以看出馬來西亞華人的各種語群，基本上都面臨了「被華語化」的危機，而且這種危機看起來似乎是對所有的華人語群是一致的。雖然沒有詳細的調查資料，不過研究大馬華人（特別是客家人）多年的 Carsterns (2005: 269 note13) 相信，在大馬，使用廣東、福建跟潮州話進行國內與國際貿易的華人家庭，基本上比較少會讓華語取代掉他們原本的母語，但相對來說，客家話就比上述這些語言弱勢得多了，它被華語或其他語群取代的情形是更為嚴重。

另外，表 2 也告訴我們，馬來西亞客家人，除了東馬的砂勞越與沙巴地區有比較聚集的客家聚落外，在西馬這邊，客家人幾乎都是跟廣東人、福建人雜處，其間當然也有零零落落的客家聚落，譬如著名的吉蘭丹內陸地區的布賴村或北馬一帶的沒落錫礦鄉鎮就是。雖貴為華人人口的「老二」，但由於人口不如廣東、福建籍人集中；加上語言上的亞群支派比較多，有海、陸豐的惠州客；有潮陽、揭陽、饒平、惠來等的河婆客；有梅縣（過去稱為嘉應）、興寧、五華、鎮平等的梅縣客；還有大埔、豐順的大埔客等，各有不同的口音，造成其在語言上難以整合，因此也就很難形成像粵、閩語般的

強勢語言。³ 再加上馬國華語，透過華文教育運動及華人普遍對國家單元教育政策的不滿，此外，新加坡的華語電視和台灣音樂歌曲流行文化的影響，以及中國的「崛起」等因素，在在使得華語也愈來愈在部份地區成為強勢的語言（尤其是南馬一帶），而與廣東話、福建話形成三足鼎立的狀態。至於客家話、客家意識或客家認同則在這場競逐中，愈發成為隱形或雙重隱形的邊緣或無聲的語言與意識，從公共領域中退下陣來，而只能成為家庭中使用的語言。

可見年輕世代的客籍華裔子弟的確承受了來自華人作為一個對外（即相對於馬來人）的群體宣稱，以及國家語言、文化等政策的壓力；因而在「客家認同」上呈現出雙重隱形化的現象（張翰璧、張維安 2005）。在馬來西亞的脈絡中，雖然於八十年代曾經流行過「方言」⁴（包括客家話）電視連續劇和客家歌曲，但對這些年輕人的影響並不很大。由於公共領域中尚保留了冷戰時期的「方言」廣播新聞節目⁵（雖然許多受訪者都說聽不懂或很少聽），這些都多多

³ 最為實際的例子是有一次筆者訪問砂勞越客屬公會的張云青秘書，當詢及為何在公會辦的正式場合或典禮上，包括會長、客家耆老等，全程都用華語來致詞。他的回答是其實在公會內部的會議中，正式的用語也是華語，原因無他，正是因為公會的理事們有來自各個客家語群者，以任何一重客家亞語來進行，都有問題，也都不理想，所以華語才成為大家溝通的工具。參考（蕭新煌等 2003：19）。

⁴ 此處所謂的「方言」乃是按照當地華人對於祖籍語言與華語的稱呼而來，後者雖然是華文教育採用的語言，但在馬來西亞的語言/教育政治下，卻逐漸取得並鞏固了其被稱為「母語」的地位，至於人們日常使用的語言，譬如廣府話、福建話、客家話、海南話等，卻被貶為「方言」的地位。

⁵ 那是英國殖民時期，為了對付馬來亞共產黨而開設的廣播宣傳節目，利用福建話、廣府話、客家話、海南話、潮州話等，向居住在偏遠或靠近森林邊緣的華人進行心理喊話，以阻遏共產黨對這些地區華人的滲透與爭取支持。到了今天，這些語言尚被保留下來，但主要以整點新聞的節目形式存在。在眾多的方言中，唯一獲得繼續發展的似乎是廣府話，這可能跟整個馬來西亞華人流行文化，從 80 年代起，由於商業利潤的考量而大量引進香港電影、電視節目有很大的關係，當然香港流行文化為大多數馬來西亞華人所接受的內在因素，也可能是因為這兩個地方有著相同的殖民文化，以都市作

少少對客籍年輕人的「客家意識」之留存有所影響；但是更大的作用應該還是來自他們的家庭中的長輩：父母或祖父母。⁶ 在他們的家庭社會化過程中，客家語言的傳承被他們視為是最重要的客家意識之文化表徵。這種留存於私領域的客家意識，是促成即便在「國家」與「華人」的雙重夾殺下，「方言」意識依舊存活於馬來西亞的原因。不過，客籍青年也都坦承他們已甚少在公開場合使用客家話。

⁷

四、私領域中的客家意識

與研究者判斷認為華人亞族群（Chinese sub-ethnic）認同，包括客家，乃是分枝的（segmentary），一般的人似乎都會知道自己的亞群，但對於再細分的部分可能就會隨著世代而淡薄的觀點（Tan 2000），似乎在訪談的樣本中也證實了這一點。在我們的訪談對象中，他們對於自己是否為客家人的答案是很堅定的，除了一人不是

為背景的移民社會文化之契合性所造成的。

⁶ 這些初步的發現接近徐正光與蕭新煌於 1995 年，在台北地區進行的客家族群的語言問題調查分析的結果。其中，在他們的分析中發現「在工作場所中，客家話已幾乎消失其社會功能，而北京話與閩南話則在不同的場域有各擅勝場的表現。我們發現客語不僅已退縮成為家庭內部使用的語言而已，而且即使在家庭中，客語的地位也隨著世代的更替，居住環境的變異以及家庭中不同語群的介入…也已日漸降低其傳遞家庭社會化的功能。」參考（徐正光，蕭新煌 1995：32）。

⁷ 反之，來自砂勞越的福州籍青年就很樂意在公共場合中使用福州話溝通，特別是當說話者不欲讓第三者了解她們在說什麼，或批評第三者時。福州籍青年比起其他方言青年，更會形成自己的小團體，使用自己熟悉的語言，因而被批評為喜歡搞小圈子的一群華人。這種對於自己母語的驕傲／重視，在砂勞越的華人社團圈子裡長可看到，因而造成一些非福州籍華人感到不耐，認為福州人太過目中無人、非常團結等等的印象。砂勞越福州籍華人這種對自己語言的態度，一方面當然是因為他們都生活在一個特定的區域，即詩巫，有很大的關係。在那裡，福州話是所有人群的通用語（lingua franca），因而使得那裡的福州裔華人對其語言的信心。

很確定父親的籍貫為何外，其餘的受訪者似乎都採用了父系的原則作為自我認定的標準，即只要他們的父親是客家人，他們就是客家人的後裔。但是對於自己是哪一種客家人，除了三個不清楚外，大部份的受訪者都知道自己屬於何種客家人。其中，自稱是河婆客家人的有四個、海陸豐兩個、大埔兩個。但若再細分下去的話，只有一個受訪者可以完整地回答其祖先所來自的鄉村。因此，證明年輕一輩對於父祖輩所來自的家鄉村落已經沒有清楚的印象了，大概只有編列族譜或親屬中的耆老還會記得這麼細節。

這些客家子弟之所以知道自己的客家身分，主要是透過家庭中長輩的耳提面命，以及家裡頭父母—子女或長輩—晚輩所使用的溝通語言為客家話的結果。因此，當問到他們是怎樣知道自己是客家人時，他們的回答如下：

「父母說。」(v010)

「從小爸爸媽媽告訴我們。」(v006)

「從小家人都是以客家話來交談的。」(v009)

「因為爸與婆婆/親戚是用客語交談。」(v008)

「爸爸媽媽告訴我。在家裡都是講客家話的。」(v003)

「爸從小在與我們對話時就常說：『我們客人是很勤勞的』，我就是這樣懂。」(v011)

「因為我以前是跟隨我的家庭長大，與父親的兄弟姐妹一起住，大家都講客家話，婆婆跟公公都會告訴我們是客家人，然後我住的新村大部分是客家人。」(v001)

「從小就灌輸。從小我們去到婆婆的家，我們叫 a neh。因為外面【的人】都叫婆婆，我問爸爸，【他說我們是】客家大埔」(v007)

其他被提出的緣由尚包括習俗、美食等：

「在辦理一些傳統習俗時是依據客人的習慣去進行例如結婚過大禮。還有從婆婆所煮的客家傳統美食好比擂茶。」(v008)

可見不管是透過語言、食物或習俗以達成個人對作為客家人的認知，在在都顯示了家庭生活對個人的客家身份之確認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而這也驗證了學者對於東南亞客家認同的論點 (Hsiao & Lim 2006)。誠如 Carstens 指出的：

雖然華語、英語跟馬來語通常都在官式的場合使用，但馬來西亞華人在自己的家庭裡（知有那些住在新山的華人除外）幾乎都是透過所謂華人方言來相互溝通的…有些家庭裡，方言混合了華語或英語，有的則完全使用華語，而只有很少的家庭是純粹用英語的家庭，因此，小孩在一種運用華人語言的環境中接受社會化被視為規範。家庭內使用方言跟多種語言乃是馬來西亞片斷與變動的教育政策，以及華人以懂得多種語言之能力為傲的結果。方言在華人家庭中維持其重要性，一方面是因為它們可以讓未受教育（特別是老一輩的女性）與接受不同教育（過去是方言，之後華語，然後有的轉向英語；現在則是華語、馬來語跟英語）的不同世代家庭成員之間得以溝通。(2005: 219)

對許多受訪者而言，判定一個人是否為客家人的標準以語言為主。雖然如此，客家話的重要性卻不被特別強調，尤其是在公共的

場域裡。人們通常不會特別去提自己父執輩的籍貫，即便知道對方同是客家人會有喜悅的感覺。因此，當被問及如果遇到一個華人時，受訪者會以什麼語言來跟對方溝通時，答案幾乎是清一色的「華語」，或者是按照區域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溝通語言；就如 v005 這位受訪者說的：「看在哪裡，如果是在檳城的話，就用福建話；在吉隆坡的話，就用廣東話；在怡保的話也用廣東話；柔佛的話就用華語」。這種在溝通語言上的變通，在馬來西亞應該是很普遍的，換句話說，幾乎每個華人都至少得具備兩到三種華人方言的能力：從北馬的檳城、吉打、吉蘭丹與登嘉樓廣用的福建/閩南話；到中馬的霹靂、彭亨、雪蘭莪與森美蘭地區的廣東話；最後到南馬的馬六甲與柔佛的華語。不同語言在這些州屬的流行，除了因為方言人口移民歷史悠久、執掌商業或貿易網絡以外，鄰國的影響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這尤其是因為南馬靠近新加坡，受到新加坡推行華語政策以及新加坡電台電視台「華人」節目全面華語化的影響非常深遠。⁸ 在這些地方優勢語言中，客家話似乎並沒有佔據任何的地位，充其量，它只在一些鄉下地方或偏遠村落中流行罷了；譬如沙巴州的古達、砂勞越的石隆門、石角（Batu Kawa）以及西馬的布賴村（Pulai）和其他曾經風光一時但已沒落的霹靂、雪蘭莪、森美蘭州大大小小的

⁸ 新加坡從 1950 年代起推動多元語言並存的語言政策，獨立後政府開始推動以英語為第一語言，其他的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則為學生必修的第二語言或母語，英語成為主要的教學媒介語。這樣的政策到了 70 年代，被發現造成其他非英語源流學校的大幅度萎縮，加上以華語作為教學媒介語的南洋大學面臨被政府關閉的窘境，新加坡政府於 1979 年推行了「講華語運動」（Speak Mandarin Campaign），參考（葉玉賢 2002）。在此政策之下，新加坡的廣播電視節目也開始製作以純華語為主的「華人」節目，或將進口的港劇翻譯成華語。接近新加坡的馬六甲南部到柔佛州境內地區，許多華人家庭都在自家裝設了高高的電視天線，就是為了收看新加坡的第五與第八頻道的華語節目。參考（陳嘉榮等 2002；郭振羽 1975）

錫礦產區。除了由於聚集在鄉村地區外，⁹客家人也因為在商業上不如福建或潮州人發達，因而使得其語言也就無法形成優勢的華人共通語。

多語的現象也出現在家庭的環境裡，這主要是因為教育的影響。譬如 v001 這位母親為福建人，父親是客家人的受訪青年如此回答他本人在家裡使用語言的情形：

「我跟我媽是以華文溝通，但偶爾會講一兩句客家話。至於親戚，就使用客家話。父母之間是講客家話，媽媽是聽得懂客家話，她雖然是福建人，但不會講福建話。而我跟父母主要是以華文來交談，但我跟親戚如叔叔、伯伯、表哥等就以客家話來溝通。」（他們兄弟姐妹之間也是以華語來溝通為主，從小他們跟母親就用華語來溝通）

可能是這位受訪者所居住的地區，即彭亨州勞勿的 Sungai Lui 這樣的一個客家聚落，因此在客家語言的使用上，他會有比別人更多運用客語的機會。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華人次族群間的通婚，常是造成客家語甚至在家庭用語中也開始退隱。在許多家庭中，客語其實是「父語」而非「母語」。

語言的使用，除了有來自生活環境的影響外，外在環境的限制

⁹ 在這裡，我們可以套用施添福（1987）研究清代台灣漢人祖籍分布與原鄉生活方式之關係，而推論出馬來（西）亞客家人之所以多依山而居，主要是因為他們的祖先在移民過來前，於中國的家鄉也是以山居或從事山上種植、開採礦產維生。這種謀生的技能，一方面由於 18 世紀客家人大量遷移到西婆羅洲從事金礦開採，而廣為東南亞的統治者知曉；他們透過跟中國商人的貿易而引入客家移民，以增加其自身的稅收。另一方面則是客家移民後所形成的一種網絡，提供了後來移入者各種工作的訊息以及降低新移民的風險成本也是促成客家聚落在許多礦產區域形成的原因。參考（施添福 1987；Wang 1995；Heidhues 1992, 2003）

也很重要。以在馬來西亞生活為限制條件，我們得出以下的表三：

表 3 受訪者針對在馬來西亞生活中各種語言重要性的優先順序表

| 受訪者 | 第一優先 | 第二優先 | 第三優先 | 第四優先 | 第五優先 |
|----------|------|------|------|-----------|------|
| V001 | 英語 | 馬來語 | 華語 | 客家話 | |
| V002（西馬） | 廣東話 | 華語 | 英語 | 馬來語 | |
| V002（東馬） | 華語 | 馬來語 | 客家話 | | |
| V003（西馬） | 廣東話 | 華語 | 英語 | 馬來語 | |
| V003（東馬） | 客家話 | 華語 | 馬來語 | 英語 | |
| V004 | 馬來語 | 英語 | 華語 | | |
| V005 | 英語 | 馬來語 | 華語 | 方言（依地區而別） | |
| V006 | 華語 | 英語 | 馬來語 | | |
| V007 | 馬來語 | 英語 | 華語 | 客家話 | |
| V008 | 馬來語 | 英語 | 華語 | 廣東話 | 福建話 |
| V009 | 英語 | 馬來語 | 華語 | | |
| V010 | 馬來語 | 廣東話 | 英語 | 華語 | |
| V011 | 馬來語 | 英語 | 華語 | 福建話 | 客家話 |

從表 3 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大多數的受訪者，若考量生活的地區為西馬的話，幾乎都會認為馬來語、英語跟華語為最重要的三種語言，間中偶爾會出現廣東話，特別是對東馬來的客家青年而言，這可能是因為講廣東話的在東馬華人社群中所佔比例很小，對於他們現在所處的吉隆坡環境，當然會認為廣東話是主流。雖貴為客家子弟，但客家話被大部分的受訪者視為在馬來西亞生活上是比較不重要的語言，除了來自東馬的兩位受訪者外，那主要是因為她們可能考慮到自己回東馬生活，客家話在當地的重要性才被突顯出來。

換句話說，在職場或公共領域中，客家話被置於比較不重要的地位，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它原本在大社會中就處於非常不利的位置；誠如一位受訪者指出的：「覺得在外社會生活【客家話】比較不重要，只是用於與客家人溝通而已」(v001)。誠如上述，客家人比較多集中在鄉村地區，至少在西馬的大都會地區，非客家方言是強勢：

我反而覺得客家話用在社會上會比較少，如果是福建話或者是廣東話會比較多，如果是在 KL【吉隆坡】或者是森美蘭，那些都是用廣東話；然後福建話馬六甲大多數人都會講，檳城也是；如果客家人的話，就可能要到一個 kampung【鄉村】比較多，好像我公公婆婆之前住在森美蘭知知港【Titi】，那一區全部人都是講客家話。(v004)

馬來西亞華人方言群人口分布，城鄉的差別似乎命定了客家話的弱勢。因此，很自然地，這些受訪的客籍青年就會認為客家話在社會上並沒有實際的用途，因為外在的行業、商業網絡、工作機會等，都為非客家語系者所壟斷。客家人要在這樣的環境下求生存，就必須隱藏自己的客家身分，學會生活週遭強勢的語言或方言。

客家語言成為家庭或私領域的溝通語言，除非人們所居住的社區本身就是以客家人為多數或優勢，譬如我們的受訪者中來自彭亨州勞勿縣以及砂勞越的 Batu Kawa 地區就是如此。但也正因為如此，使得他們對於客家語言的流失沒有很大的危機感。誠如一位客家青年在回答是否認為客家社團在晚間開設客語課程的必要性時說：「我覺得沒有必要，因為如果父母本身是客家人的話，自然會把客家人的傳統傳達給下一輩，比如說跟他們用客家話溝通、教導他

們客家話是我們的根，多少都會講一點，不然出到社會上被人認出是客家人，但不會講客家話，那將是會很丟臉的事情」(v001)。也就是說，從受訪者的角度出發，客家語言的傳承成為客家家庭必須承擔的功能之一，並非由家庭以外的社會組織來代勞。同樣的問題，另一位客家青年的回答是：「沒有必要，…【因為客家話是一個家庭內的籍貫之語言】，這東西【指客家話】爸爸媽媽可以自己教」(v002)。

對於曾經在馬來西亞華人社群間紅極一時的電視劇〈四喜臨門〉(Empat Sekawan)中有使用過客家話，大多數受訪者並不知道，¹⁰ 可能是因為他們都很年輕，當他們還小的時候，這些本土劇已經逐漸走入了歷史，因此使得他們無緣觀賞。70年代本地流行歌曲也包括客家歌曲，邱清雲以一首〈阿婆賣鹹菜〉走紅馬來西亞歌壇，我們的受訪者幾乎都不知道有這個人，直到今年(2006)七月邱因病過世，經過媒體報導才使得一些客家青年聽說此人。¹¹ 在他們的

¹⁰ 這部被譽為馬來西亞本地電視圈的經典長壽劇，是從 1965 年開始拍攝，演出長達 20 年之久。主要的主角包括藝名為海洋(福建話)、黃河(廣西話)、黎明(客家話)與韓瑛(廣東話)以及馬來和印度演員等的所為「方言諧劇」。這些基本演員後來也在 1980 年代在麗地呼聲電台(Radifusion)重播。這部電視劇充分反映了馬來西亞多元種族的社會現實，通過嬉笑怒的方式來讚揚或嘲諷種種當下的社會現象，吐露市井小民的一般心聲。劇本是由馬華文學界的前輩姚拓所寫。1969 年的 513 種族衝突事件後，所有的傳播媒體更被視為執政者政令宣導的管道，限制了電視節目內容，電視製作人自我審查、自我設限益發嚴重。〈四喜臨門〉在後 513 的政治環境下變成是強調種族和諧(因此劇中必定要出現馬來跟印度演員)、國家統合的目標。1980 年代中期以後，由於馬來西亞電視台私營化的結果，私營電台開始大量引進港劇，捨棄了本地製作的電視劇，使得港劇在大馬華人大眾文化中大行其道。參考〈2001 年世界華文媒體與華夏文明傳播學術研討會〉以及〈姚拓：創作生涯篇〉。

¹¹ 邱清雲原名為邱武來，於 1947 年生於森美蘭州知知港新村。祖籍為福建，但由於生活在以客家人為多數的知知港，因此講得一口非常流利的客家話。80 年代末，他開始淡出歌壇，轉行當算命先生，並深受糖尿病折磨達 20 年之久。2006 年 7 月 22 日過世。參考〈不是客家人唱紅客家歌《阿婆賣鹹菜》攀巔峰〉以及〈邱清雲〉。

世代裡，能夠認識目前還活躍於歌壇的客家歌手張少林者已是寥寥無幾了。¹² 其實整個大馬華人流行文化市場從 80 年代中以後，已經為港（主要是廣東話電影、電視劇）臺（主要是華語流行音樂歌曲）的文化產品所佔據。因此，大部分的受訪者的成長時期，都落在這段時期，他們對於本土曾經流行過的客家歌曲沒有概念，也無法接觸來自臺灣的客家創作流行歌曲。在流行文化被港台產品攻陷、面對媒體私營化的潮流，媒體不得不朝「商業」的方向思考，而更加速港臺大眾文化產品的輸入，或製作以粵語為主流的本土電視劇；再加上華人社會文化精英提倡華語作為全體華人共同的「母語」，¹³ 使得被打入冷宮的「方言」如客家話變成無法登大堂之雅的語言。客家人在大部分馬來西亞的都會區（沙巴除外）都非優勢的語言，因此使得客家話只能是以客家人為主的鄉下，或客家家庭中使用的語言。客家流行歌曲的停頓似乎跟這些環境的局限、發展有著很大的關係。

¹² 張少林是繼邱清雲之後，在大馬本地歌壇上闖出名堂的客家歌手，其實後者早期的一些成名曲幾乎都是出自前者的手。張少林於 1978 年出道，是邱清雲成名曲〈阿婆賣鹹菜〉的幕後詞曲功臣。2002 年，他推出個人客家專輯〈路霸〉而大賣。參考〈張少林星光耀雞店〉。

¹³ 華語作為華人「母語」之論述從 50 年代起就由於對抗英國殖民的同化教育政策而被提出來，歷經半個世紀的奮鬥、爭取與堅持，如今似乎已成為大部份華人，尤其是受華文教育者所堅信的語言文化理念。這個論述認為，華語的維持是作為華人族群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職是之故，保留華文教育體系被視為是讓華語華文維持不墜的不二法門。可是，從 Baba 社會文化的人類學研究中，研究者發現「華語」只是作為華人的其中一種象徵符號，並非作為華人的全部表徵。像 Baba 華人的例子，他們不會說華語，但卻保留了比一般華人更傳統、細緻的儀式、生活方式等，並自認為華人（Tan 1998）。

五、公領域中的客家

目前尚殘存在大馬公共空間的客語現象，大概只剩下馬來西亞電台第五台每天早上十點的客語新聞了。¹⁴ 第五台或 Radio 5 的前身是檳城 ZHj 電台，成立於 1936 年。日據時期為日軍佔用，播放日語新聞。戰後，英國殖民政府成立馬來亞電台，第五台也被稱為 Rangkaian Hijau，專門播放以華人社群為對象的廣播節目。為因應馬來亞共產黨的武裝鬥爭，英國人於戰後的 1948 至 60 年，執行了 12 年的戒嚴，增加以客家話、廣東話以及福建話為主的政府政令宣導，以及對共產黨員進行心戰喊話之廣播節目。眾所皆知的事實是，當時馬來亞共產黨對於鄉區華人的影響很大，因此英國政府採取這樣的方言廣播政策以對抗共黨對鄉村華人的宣傳與滲透。在這樣的政策考量下，卻不意為上述的三種華人方言在馬來西亞留下公共發聲的管道。1957 年馬來西亞獨立後，第五台維持了英殖民時期的華人方言新聞播報之特色，即客語、廣東話、福建話以及潮州話在不同時段的新聞。這是否彰顯了馬來西亞政府欲維持華人在語言上「分裂」之事實，還有待深入的研究。

雖然那並非馬來西亞政府或之前的英國殖民政府，基於發展或維護客家話在公共空間之使用而推行的政策；而是基於個別的政治考量才讓客語新聞得以傳承半個世紀以上直到今天，但從維持客家人的客家意識之角度來看，客語廣播卻也似乎提供了一種工具。許多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聽過該時段的客語新聞：「至少還有一段時間是

¹⁴ 參考 <Sejarah Radio 5>。

屬於我們自己客家話的時間。」(v001)但是單純只是客語新聞對一些客籍青年而言，顯得缺乏吸引力，誠如一位受訪者指出的：「如果真的是要客家繼續生存下去的話，應該搞一些比較有 interesting【有趣】的東西來吸引人家吧。【譬如】遊戲節目、問答之類的，除非有獎勵人家才會【收聽】。」(v005)對年輕世代而言，這種用客語廣播的節目，對他們不常使用客語作為溝通語言者而言還是顯得有些奇怪，其中一位受訪者認為：

講英文就比較專業，至於講客家話的，不是說它不專業，就是說它的那個形式不一樣吧。我覺得對新一代的人來說，我相信我們不會去聽。如果多方面來講的話，就是要保留給其他可能比較年長的，他們有在聽的話是應該吧，可是就沒有像普遍地大家都在聽。(v004)

當然還有更多的受訪者(v002, v003, v005, v006, v008)，不只對電台的客語新聞毫無興趣，甚至連所播報的內容都聽不太懂或不懂，可能的原因是電台的客語新聞使用的是四縣腔調的客語，對許多海陸或大埔客家人而言，就會有聽不太懂的問題存在。

由於從 80 年代中起，馬來西亞整體的華人社會之大眾流行文化，迅速地為港（粵語）臺（華語）文化產品所攻陷，本地的大眾文化產品抑或在市場成本利潤考量下紛紛退場；或開始遵循港臺之生產模式，以粵語（比較是主流）或華語（比較邊緣）來製作本地的大眾文化產品。在近 20 年的獨霸市場後，粵語與華語的大眾流行文化，儼然成為大馬華人不可或缺的文化糧食，對於年輕一輩的華裔子弟，更是如此。因此，此時如果我們將臺灣的客語偶像劇引入大馬的華人大眾文化市場的話，這些客籍新世代的反應會是如何

呢？底下是我們這次訪談中所收集到的一些觀點：

太奇怪了。因為我們一直接受的文化是屬於講華語的偶像劇，突然間冒出這樣的【即客語的】偶像劇，可能會不懂，可能不吸引我…，會覺得很滑稽。(v002)

可是我有看過【講】福建【話】的，就覺得整個狀況有點奇怪，就很不真實，講華語的話還能夠接受，因為大家都在講華語。…

【談到為何能夠接受香港的廣東話，卻不能接受臺灣話】我們接受是因為它是香港那一邊，而且在馬來西亞 KL【吉隆坡】，去哪裡都有人在講廣東話吧，去吃東西可能都講廣東話，我覺得如果是客家話的話不普遍。…可能接受（廣東話）比較久了，從小就有接觸香港就是講廣東話，然後戲劇也是講廣東話，福建的話可能之前都沒有在看吧…偶而這樣看一下就覺得奇怪。我覺得如果是客家話可能也跟福建【話】一樣吧。(v004)

【當談到客語偶像劇時】不會去看，除非他的語言配音換【成】華語。(v003)

可見當某種語言在公共領域內被壓制久了，說這語言的人們對於它突然又出現在公共場域會感到很錯愕、奇怪，對自己的母語缺乏信心，形同那些被長期殖民壓制下的人們最後內化了殖民者的價值一樣，排斥在公共領域使用自己熟悉的語言，或認為使用自己的母語是一種恥辱、羞恥的舉動，因而更抬高了對於殖民者語言的價值或地位。

六、小結：家庭、方言與客家意識

人類自呱呱墮地所學習的語言，都是以母親的語言為始，它因而形成自我與發展個性的來源與動力，並成為孩子認識其世界的主要工具。誠如 Harold R. Isaacs 所言：「在孩子與其他人（尚存的或已逝的）所構成的整個天地之間，母親的語言搭起一座橋樑，向今天或過去所有說同樣語言的人延伸出去」。（伊薩克 2004：145-146）本文針對馬來亞大學客家籍學生進行的調查顯示，年輕世代的客籍華裔子弟的確承受了來自華人作為一個對外的群體宣稱，以及國家語言、文化等政策的壓力；因而在「客家認同」上呈現出所謂的雙重隱形的現象。但是在馬來西亞的脈絡中，雖然於八十年代流行的方言（包括客家話）電視連續劇、客家歌曲對這些年輕人的影響並不大，但由於公共領域中尚保留了冷戰時期的「方言」廣播新聞節目（雖然許多受訪者都說聽不懂或很少聽），這些都多多少少對客籍年輕人的「客家意識」之留存有所影響；但是更大的作用應該還是來自他們的家庭。在這份研究中，我們發現客籍青年的「客家意識」大多來自家庭中的長輩：父母或祖父母。在他們的家庭生活過程中，其中語言的傳承被他們視為最為重要的客家意識之文化表徵。這種留存於私領域的客家意識，是促成即便在國家與華人的雙重夾殺下，「方言」意識依舊存活於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原因。

雖然如此，但在我們的調查中也發現，許多受訪的客家青年其實已經無法使用流暢的客家話，唯他們的客家意識依然存在。從訪談中，我們可以發現這種保留在私領域的客家意識，在主觀上，是由歷史和起源連結起來的。引用 Isaacs 的話來說，正是這條歷史的贊帶，將個人與他所屬於的群體的過去與未來串聯起來：「滿足了個

人某些最深沉、最迫切的需要。人從哪裡來，往何處去，死去的時候是否就此孤零零地結束？所有這些需要確認的事情，都可以讓他知道，自己同那些尚存的或已逝的人是相連的，透過親子、家庭、親屬的關係，自己同他們是血脉相連的，在時間之流中擁有共通的祖先、前賢、信仰，以及想像的或歷史的經驗。」（伊薩克 2004：178）因此，祖先的祖籍似乎就成了那臍帶，讓馬來西亞年輕世代的客家人能為個人的認同加以定位。¹⁵

¹⁵感謝張雯勤博士對本文的評論以及黃蘭翔老師提供的一些意見。

參考書目

- 林開忠，2000，《建構中的“華人文化”：族群屬性、國家與華教運動》。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
- ，2003，〈砂勞越石隆門客家人的十二公司：問題與討論〉。《海華與東南亞研究》3（2）：20-60。
- 施添福，1987，《清代在台漢人的租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台北：師大地理學系。
- 哈羅德·伊薩克（Harold R. Isaacs）著，鄧伯宸譯，2004，《族群》。新店：立緒文化。
- 徐正光、蕭新煌，1995，〈客家族群的語言問題台北地區的調查分析〉。《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10：1-40。
- 郭振羽，1975，《新加坡的語言與社會》。台北：正中書局。
- 陳嘉榮等，2002，《新新關係：看新山人如何新加坡》。吉隆坡：大將事業社。
- 張翰璧、張維安，2005，〈東南亞客家族群認同與族群關係：以中央大學馬來西亞客籍僑生為例〉。《台灣東南亞研究學刊》2（1）：127-154。
- 葉玉賢，2002，《語言政策與教育—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比較》。台北：旭昇圖書公司。
- 蕭新煌等，2003，《海外客家基本資料調查：第一期計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 蕭新煌、林開忠、張維安，2007，〈東南亞客家篇〉。頁 563-581，

收於徐正光主編，《台灣客家研究概論》。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台灣客家研究學會。

〈2001年世界華文媒體與華夏文明傳播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於
<http://www.ldxw.org/bbs/dispbbs.asp?boardID=15&ID=2336&page=2>（瀏覽日期：2006年11月16日）。

〈不是客家人唱紅客家歌《阿婆賣鹹菜》攀頂峰〉。光明日報，2006年7月22日，於<http://www.guangming.com.my/gmgn.phtml?sec=193,16&artid=200607221345&data=>（瀏覽日期：2006年11月19日）。

〈吉隆坡繁華功不可沒，客家學數典論功績〉。東方新聞網，於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_item.asp?NewsID=4275（瀏覽日期：2007年6月27日）。

〈邱清雲〉。於<http://www.hakkaw.com/News.Asp?NewsID=43&Istype=2>（瀏覽日期：2006年11月19日）。

〈姚拓：創作生涯篇〉。於<http://mahua.sc.edu.my/student/exhibition.htm>（瀏覽日期：2007年9月6日）。

〈馬來西亞華人特有社區詞語解讀及交流版〉。於
http://www.angelfire.com/sc/Yew_Weng/language.html（瀏覽日期：2007年6月22日）。

〈張少林星光耀雞店〉。於<http://www.Hakkaonline.com/forum/thread.php?tid=22888>（瀏覽日期：2006年11月19日）。

Carstens, Sharon A., 2005, Histories, Cultures, Identities: Studies in Malaysian Chinese Worlds.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Heidhues, Mary F. Somers, 1992, Bangka Tin and Mentok Pepper: Chinese Settlement on an Indonesian Islan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_____, 2003, Goldiggers, Farmers, and Traders in the “Chinese Districts” of West Kalinantan, Indonesia. Ithaca: South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 Hsiao, Hsin-Huang and Lim Khay Thiong, 2006, “The Formation and Limitation of Hakka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kka Studies in Taiwan, Taipei: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re, October 29-30, 2006.
- Siow, Moli, 1983, “The Problems of Ethnic Cohesion among the Chinese in Peninsular Malaysia: Intraethnic Divisions and Interethnic Accommodation.” Pp. 170-188 in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vol. 2, edited by L. A. Peter Gosling and Linda Y. C. Lim. Singapore: Maruzen Asia.
- Tan, Chee-Beng, 1998, “People of Chinese Descent: Language, Nationality and Identity.” Pp. 29-48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Selected Essays, vol. I, edited by Wang Ling-chi and Wang Gungwu.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s Press.
- , 2000, “Socio-cultural Diversities and Identities.” Pp. 37-70 in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edited by Lee Kam Hing and Tan Chee-Beng. Shah Al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Tai Peng, 1995, The Origins of Chinese Kongsi. Petaling Jaya:

Pelandok Publications.

“Sejarah Radio 5”。於 <http://www2.rtm.net.my/radio5/sejarah.htm>(瀏覽日期：2006 年 11 月 20 日)。